

论《相风赋》的兴起及其文化意义

孔德明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相风在两周时期为春官保章氏所执掌,用于辨吉凶以诏救政、访序事等。至晋时其占吉凶之先见的功用依然不变,且又赋予了新的文化意蕴,成为昭示百僚允则、彰我皇度的中朝大驾的仪仗法物。现存《相风赋》均为晋人作品,赋家们在《相风赋》中对晋武帝给予高度赞颂,迎合了武帝怀方来远,混一六合的舆论需要。《相风赋》对相风的夸赞,可看作是晋初复兴儒学名教思潮的标志之一,也是《相风赋》兴起繁盛于此时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相风赋;西晋;晋武帝;泰始年间;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1-0105-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1.016

The Rise of Xiangfeng Fu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KONG Dem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Xiangfeng, observation of wind direction, was wielded by the certain person in Zhou dynasties for judging good or ill luck, and this function was kept to Jin dynasty. Furthermore, more new cultural significance was given and was important for the royal guard of honor. The existing version was finished in Jin dynasty and scholars sang high praise for the contemporary emperor and the public opinions. The praise of Xiangfeng was one of the symbols to Confucian recovery in early Jin dynasty and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prosperity of Xiangfeng Fu.

Key words: Xiangfeng Fu; Western Jin dynasty; the first emperor in Jin dynasty; during the years from 265-274; cultural significance

《相风赋》在所遗存赋篇中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大,故关注者亦较少。但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很值得关注和思考的:即所遗存作品基本上都是晋武帝朝赋家所作,且大约均作于晋武帝泰始年间。《相风赋》为何兴于此时,又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赋作本身探寻出其中之历史文化意蕴,并由此反映出某种历史文化现象,昭显某种历史文化内涵,无疑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

作。”^[1]清陈元龙于《御定历代赋汇》“正集”中收录张华、潘岳、孙楚、陶侃等所作《相风赋》四篇,又于“逸句”中收录傅玄、傅咸父子所作《相风赋》二篇。严可均的《全晋文》收录了晋傅玄、傅咸、张华、孙楚、杜万年、陶侃、潘岳、牵秀、左芬、卢浮等人所作《相风赋》十篇,其中傅玄、傅咸、杜万年、卢浮、牵秀所作《相风赋》剩为残篇,左芬所作《相风赋》仅存赋目。《历代赋汇》与《全晋文》所收录《相风赋》全为晋人作品,《隋书·经籍志》亦曰“傅玄等作”。这是不是就可以断定《相风赋》兴起于晋呢?当然不能。因为宋代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天部九·相风》就收录了一篇汉人郑玄所作《相风赋》,今人费

《隋书·经籍志》云:“《相风赋》七卷,傅玄等

收稿日期:2016-09-24

作者简介:孔德明(1972—),男,河南新县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魏六朝辞赋研究。

振刚在编订《全汉赋》时亦收录之。

虽说郑玄《相风赋》是现今可发现的典籍所载此类赋作中作时最早的一篇,但此《相风赋》是否确为郑玄所作却令人怀疑。因为把此《相风赋》系名于郑玄者仅见《御览》,而历代史志目录及私家目录书皆未见载有郑玄《相风赋》,后人所辑补《后汉书艺文志》如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顾怀三《补后汉书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等均未见著录郑玄《相风赋》。不仅如此,且《御览》所引郑玄《相风赋》与晋傅玄《相风赋》赋文全同。不同朝代的两位赋家所作《相风赋》完全雷同,不可能巧合到如此程度,定有真伪之别。严可均在《全晋文》中把这篇赋收录在晋傅玄的名下,并进行了辨正。严氏说:“《北堂书钞》一百三十、《艺文类聚》六十八并作傅玄,《御览》九误作郑玄,近人辑《康成集》载此赋,非也。”^{[2]1716}严氏所说甚确,此《相风赋》确为晋傅玄所作,而非汉郑玄所作,《御览》当把傅玄误作郑玄。另,宋代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二十五《和邵同年戏赠贾牧秀才三首》“生涯到处似樗乌”句下注引云:“晋傅玄《相风赋》云:‘栖神乌于竿首,俟祥风之来征’是已。”^[3]题淳熙十五年编《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云:“相风乌,晋车出驾,相风在前,刻乌于竿上名曰相风,傅玄有《相风赋》,今樗乌乃其余意。”^[4]综上观之,《御览》所著录汉郑玄之《相风赋》当为晋傅玄之《相风赋》。既然《相风赋》非郑玄作品,那么,现今可见《相风赋》之最早作品当为晋人所作。也就是说,《相风赋》这一类赋作是兴起于西晋的。

《相风赋》兴于西晋何时呢?《隋书·经籍志》载:“《相风赋》七卷,傅玄等作。”^[1]此处或暗示傅玄为最早作者。杜万年《相风赋序》云:“太仆傅侯,命余赋之。”严可均案:“序言太仆傅侯,盖傅玄也。”^{[2]1849}据《晋书·傅玄传》云“(泰始)五年,迁太仆”^{[5]1322}可知,傅玄于泰始五年后的太仆任内作了《相风赋》。或许傅玄同时也命杜万年同作此赋,这种现象在魏晋时期并不鲜见,如曹丕、曹植常命王粲、刘桢、杨修等作同名赋。由此得知,傅玄与杜万年的《相风赋》作于同时或前后不久,当在泰始五年后一段时期内。张华《相风赋》序文有“太史侯部有相风在西城上,而作者弗为”^{[2]1789}句,张华说“作者弗为”,可作两解:一是从事文章撰述的如著作郎一

类的人没有作过《相风赋》,二是这类人给其他地方如车輿仪仗中的相风作过赋,而没有给太史侯部的相风作过赋。又傅咸《相风赋序》云:“相风之赋,盖以富矣,然辞义大同。惟中书张令,以太史相风,独无文饰,故特赋之。……张氏之赋,非其至者也。”^{[2]1751}依傅咸《相风赋序》推测,张华所说“作者弗为”指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大,即在张华给太史侯部的相风作赋时,其他《相风赋》作品已有不少。从傅咸这篇赋序中,我们还可以获得这样一些信息:傅咸所作《相风赋》在张华作《相风赋》后,此前《相风赋》作品已颇为繁富;张华作《相风赋》的时间在其任中书令期间或在此前;张华所作《相风赋》之题旨与以前“辞义大同”的《相风赋》有所不同;傅咸所作《相风赋》的题旨有补于张华所作之不足。《晋书·张华传》云:“晋受禅,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数岁,拜中书令。”^{[5]1070}“数岁”不甚明确,但“数”当为表示不定的少数,其义犹几。即是说晋受禅几年之后,拜张华为中书令。晋受禅后年号为泰始,也就是说张华在泰始中为中书令。其《相风赋》亦当作于此期间。既然傅咸赋是有感于张华《相风赋》而作,当亦作于此后不久。

卢浮《相风赋》或与张华作于同时。《三国志·卢毓传》注引《晋诸公赞》云:“张华博物多识,无物不知。浮高朗经博,有美于华。”^{[6]598}张华与卢氏颇有渊源,《晋书·张华传》云:“华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卢钦言之于文帝,转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5]1068}卢钦即卢浮之父。可见,张、卢交往颇密。故卢浮《相风赋》与张华《相风赋》或为酬唱之作。从所遗存卢浮《相风赋》残句“楚石杂结绿,沙砾厕隋珠”^{[2]1656}看,不似赋文,倒像序文。与杜万年《相风赋序》“诚知武夫非荆宝之伦,长庚启明非曜灵之匹”^{[2]1849}句,词殊意同,应是谦词。所以,卢浮《相风赋》极可能为应张华之命而作。孙楚《相风赋》或作于其任佐著作郎时。《晋书·职官志》云:“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徵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5]735}既然著作郎有“周左史之任”,那么,记言录异,著文立教,亦是其责。再之,著作郎自立始隶中书省,元康二年改属秘书省。孙楚为佐著作郎与张华为中书令大致在同一

时期,所以,孙楚与张华二赋亦可以看做是互相呼应。孙楚卒于元康三年(公元293年),主要生活在武帝时期。从孙楚《相风赋》内容看,是对“圣皇”及其“治道”之美的颂扬,应是对武帝人格及早期政治的歌颂。因为晋武帝“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5]82}。由此推测,孙楚《相风赋》亦当作于武帝泰始间。

潘岳《相风赋》亦作于泰始中,《晋书·潘岳传》云:“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赋以美其事。”^{[5]1500}观其《相风赋》,亦有美武帝之意。其后“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5]1502},故其后期抒写幽怨的赋作较多,如《西征赋》《闲居赋》等。因此,《相风赋》为其早期作于泰始年间可能性大。左芬《相风赋》亦应作于武帝时期,《晋书·后妃传上》云:“帝重芬词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5]962}以此看来,左芬《相风赋》或为应诏之作。牵秀《相风赋》作于何时难以断定,秀博辩有文才,且早有美名,后司空张华请为长史。如果牵秀为张华长史后作《相风赋》,则其作时相对较晚,当在惠帝时期。陶侃《相风赋》或作于其入洛后,从其赋文“直南端以基址,双崇魏之嵯峨”和“若乃华盖警乘,奉引先驱”^{[2]2094}句看,此相风应是他于京城所见。陶侃出身寒微,其母借范逵之力使之察为孝廉。“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无忤色。华后与语,异之。”^{[5]1768}其《相风赋》或张华命作,亦或为干谒张华之作。陶侃入洛为吴平以后事,当在太康年间,故其《相风赋》亦可能作于太康间。

综上观之,《相风赋》兴起并繁盛于晋武帝泰始年间。

二

为何在晋武帝泰始中突发一股赋相风之潮呢?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考察出相风在其时的文化意蕴,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晋书·舆服志》云:“中朝大驾卤簿:……次相风,中道。次司马督,在前,中道。……次相风,中道。次中书监骑左,秘书监骑右。”^{[5]759}《艺文类聚》卷六十八云:“晋令曰:车驾出入,相风前引。”^{[7]1196}封建社会舆服制度规范有其礼教意义。《后汉书·舆服志上》云:“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

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踰,所以为礼也。”^{[8]3640}从上面可以看出,舆服属于礼的范畴,有报功章德、尊仁尚贤之用,有尊尊贵贵之序,是有其文化意蕴的。

那么,相风何时纳入礼制而用作法物的呢?相风,又称相风乌或相风铜乌,古代一种观测风向的仪器。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二云:“《黄帝内传》有相风乌制,疑黄帝始作之也。《拾遗记》曰:少昊母曰皇娥,游穷桑之浦,有神童称为白帝子,与皇娥讌戏汎于海,以桂枝为表,结芳旄为旌,刻玉为鸱,置于表端,言知四时之候。今之相风乌亦其遗像。《古今注》曰:相风为夏禹所作。周迁《舆服杂事》曰:相风周公所造,即鸣鳶之象。《礼》曰:前有尘埃则载鸣鳶,后代改为乌。沈约《舆服志》曰:相风乌,秦制。”^[9]从这段文字来看,相风的渊源至早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不论是黄帝始作的相风乌,还是少昊母皇娥所制的桂表芳旌,均可看做是后代相风乌之遗像。崔豹认为相风为夏禹所作,周迁则认为周公所造鸣鳶之象为相风之祖,后改鳶为乌。沈约又认为相风乌为秦制,其《宋书·礼志》云:“案魏命晋王建天子旌旗,置旄头云罕。……又案《周礼》辨载法物,莫不详究,然无相风、鞞网、旄头之属,此非古制明矣。何承天谓战国并争,师旅数出,悬乌之设,务察风侵,宜是秦矣。”^[10]周迁“相风周公所造,即鸣鳶之象”之说是不确的,《礼记·曲礼上》云:“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鳶。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摯兽,则载貔貅。”郑玄注曰:“载谓举于旌首以警众也。礼,君行师从,卿行旅从。前驱举此则士众知所有。所举各以其类象。青,青雀,水鸟。鳶鸣则将风。鸿取飞有行列也。士谓兵众。虎取其又威勇也。貔貅亦摯兽也。”^[11]郑玄所说甚明:“所举各以其类象”,即如有水则水鸟渡之,有风则鸣鳶御之。故此处鸣鳶为御风之类象,而非用之占风。周官中有保章氏,为占风、相风之官。所以,沈约说“《周礼》辨载法物,莫不详究,然无相风……此非古制明矣”是可信的。但沈约说相风乌为秦制,似也难落实,故其以揣测之语气说出——“宜是秦矣”。

晋朝以前,已有“务察风侵”之用的相风见记于典籍。如《淮南子·齐俗训》云:“故终身隶于人,辟若倪之见风也。”高诱注曰:“倪,侯风者也。世所谓五两。”许慎注曰:“綰,侯风也。楚人谓之五

两。”^[12]明朱朝瑛《读诗略记》卷五云：“倪，《淮南·其俗训》云‘若倪之见风’，注谓‘倪，所以候风者’。以鸡羽五两系竿首为侯，盖如后世之相风也。”^[13]又《三辅黄图》卷五“台榭”：“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一曰长安灵台上有相风铜乌，千里风至，此乌乃动。”^[14]《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引《先贤传》云：“太仆寺丞高岱立一竹竿于前庭，其上有枢机，标以鸡毛，相风色以验吉凶，凡占事能知未来。”^[15]高岱为三国时人，《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曰：“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6]1022}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云：“宋武帝平洛，所获并汉魏旧器，殿前有相风乌。”^[16]在这几例中，相风都是以“务察风侵”的工具而不是以具有礼教意义的法物面目出现的。西汉时相风制以鸡羽，东汉相风制以铜乌，三国时期虽制以鸡毛，却加以枢机，展示了一个由粗至精的过程。主要目的是为加强候风之精准，以观其明效。

据《西京杂记》载，相风成为法器始于西汉。《西京杂记》卷五“大驾骑乘数”条云：“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相风乌车驾驷，中道。”^{[17]222}《西京杂记》有学者认为是西汉刘歆所著，亦有学者认为是东晋葛洪所著。从本条所记“汉朝舆驾”看，录本条者似不是汉人，如是汉人，当言“本朝”而非“汉朝”，或略之不言。且《西京杂记》被后人看作小说家言，出自街谈巷说，故不可作为史实。《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梁刘孝威《行幸甘泉歌》曰：“汉家迎夏毕，避暑甘泉宫。栈车鸣里鼓，驷马驾相风。”^{[7]777}此诗犹比况之词，亦或据《西京杂记》而作，因为“驷马驾相风”并未见载于《史记》《汉书》。《后汉书·舆服志》载有“乘舆大驾”，同于“中朝大驾”，但未见有法物相风。《后汉书·舆服志上》云：“乘舆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备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卤簿。东都唯大行乃大驾。大驾，太仆校驾；法驾，黄门令校驾。”^{[8]3648}由此，相风作为法物出现于皇帝之乘舆仪仗最为确切的史书记载应始于《晋书》。陶侃《相风赋》云：“若乃华盖警乘，奉引先驱。豹饰在后，葳蕤清路。百僚允则，彰我皇度。”^{[2]2094}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此时相风已是中朝大驾中的一种法物了。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亦云：“晋车驾出，以相风竿在前，刻乌于竿上，

名相风竿，今檣乌是其遗意。”^[18]

如果《西京杂记》所记相风为汉大驾法物不可信，刘孝威所作《行幸甘泉歌》所云“驷马驾相风”亦据《西京杂记》所记，则晋朝“中朝大驾”之相风法物为新制。即使《西京杂记》所记汉大驾有相风法物属实，刘孝威所作《行幸甘泉歌》或另有所据，亦信实。但它们也是有区别的，《西京杂记》所记大驾乘骑中“相风乌车驾驷”，与刘孝威《行幸甘泉歌》所云“驷马驾相风”类同。而《晋书·舆服志》所载中朝大驾之法物相风分于两处，与《西京杂记》及刘孝威《行幸甘泉歌》所记不同。也就是说晋朝中朝大驾不同于汉朝大驾乘骑，其中相风規制就是个很明显的不同。对于晋人来说也算是一个新鲜异物，有其新的文化意蕴，故晋人赋颂之。从《晋书·舆服志》所载中朝大驾卤簿看，相风其后紧跟者是中书监与秘书监。所以，中书监与秘书监对相风应甚为熟悉。而中书与秘书有著作之责，亦是皇帝的喉舌，《晋书·职官志》云：“及晋受命，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掌呈奏案章。……又掌诏命。”^{[5]735}因此，他们替皇帝代言而赋相风这一新鲜异物在情理之中。又《晋书·职官志》：“太仆，统典农、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乘黄廐、骅骝廐、龙马廐等令。”^{[5]736}太仆既掌正王之服位、舆马畜牧之事，相风为舆马仪仗之属，故亦为其管制之事。如傅咸《相风赋》序载“太仆寺丞武君宾”造相风之事，《艺文类聚》引《先贤传》记“太仆寺丞高岱”制作相风之事。如此看来，在晋武帝泰始中，以中书令张华与太仆傅玄为领袖，领导文人们掀起一股制作《相风赋》的浪潮是有缘由的，亦是具有其特定历史意义的。

三

综观傅玄、张华、傅咸、孙楚、潘岳、陶侃等人的《相风赋》，创作模式大致相似，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书写，即描述相风的形制与夸赞相风的功用。是先写相风形制还是先写相风功用，顺序则不尽相同。如傅玄《相风赋》是先写相风的功用：“上稽天道阳精之运，表以灵乌，物象其类。下凭地体安贞之德，镇以金虎，玄成其气。风云之应，龙虎是从。观妙之征，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见者，莫精乎此。”^{[2]1716}再写相风形制：“乃构相风，因象设形。

螭盘虎以为趾,建修竿之亭亭。体正直而无挠,度经高而不倾。栖神乌于竿首。”^{[2]1716}孙楚作法同此,不赘述。陶侃则是先描述相风的形制,而后夸赞相风的功用。如“乃有相风之为形也,终日九征。桀然特立,不邪不倾。拟云阁以秀出,睇峻岭于层城。直南端以基址,双崇魏之嶢崢。象建木于都广,邈不群而独荣。朴虽小而巨,何物鲜而功大。眇翩翩以高翔,象离鸕于云际。擢孤茎而特挺,若芙蓉于水裔”^{[2]2094}是写形制;“若乃华盖警乘,奉引先驱。豹饰在后,葳蕤清路。百僚允则,彰我皇度”^{[2]2094}是赞功用。张华则是按照赞功用、绘形制,再赞功用、再绘形制的方式来写的。其《相风赋》云:“盖在先圣,道济生人,拟议天地,错综明神。在璇玑以齐七政,象浑仪于陶钧,考古旁于六气,仰贞观于三辰。爰在保障,世序其职,辨风侯方,必立唯极。循物致用,器不假饰。眇修干之迢迢,凌高墉而茎植。玄鸟偏其增翥,睇云霄而矫翼。嘉创制之穷理,谅器浅而事深。步元气于寻木,寄先识于兹禽。既在高而相危,又戒而自箴。虽回易之无常,终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弥世,志淹滞而愈新。超无返而特存,差偶景而为邻。”^{[2]1789}潘岳又是按照绘形制、赞功用,再绘形制、再赞功用的方式来写的。其《相风赋》云:“采修竹于层城,历寒暑而靡凋。踞神兽于下趾,栖灵乌于上标。混元恍其初判,二气变而无穷。动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终。思先天而不违,立成器以相风。栖灵乌于帝庭,似月离乎紫宫。飞轻羽于竿杪,若翔鸾乎云中。广漠兴而习饮,景风发而溯离。闾阖扬而曲指,明庶起而东移。”^{[2]1988}傅咸《相风赋》或为残篇,仅赋形制,未见夸功用。其实,夸赞相风功用就是在彰显其文化意蕴,或者说是昭示其礼教文化意义。

由赋文我们可以看出,相风的主要功用是通神明,占吉凶,诫祸福,彰皇度。如傅玄说“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见者”^{[2]1716};张华说“辨风侯方”^{[2]1789};孙楚说“虑听政之有阙,诫祸福于无形”^{[2]1801};潘岳说“虑听政之有阙,诫祸福于无形”^{[2]1988};陶侃说“百僚允则,彰我皇度”^{[2]2094}等。张华还说太史相风是序周保章氏之职。《周礼·春官》云:“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19]可见,周天子奉天行政。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引《河图帝通纪》曰:“风者,天天使。”引《龙鱼河图》云:“风者,天天使也。”^[20]风为天天使,风即传达天之意。故每有圣者行善政则有风顺而祥。如《尚书大传》曰:“舜将禅禹,八风循通。……王者德及皇天,则祥风起。”^[20]又《太平御览》卷九引《礼·稽命徵》曰“出号令合民心,则祥风至”、《礼·斗威仪》曰“人君政颂平,则祥风至”。^[20]汉董仲舒亦曰:“太平之世,风不摇条,开甲破萌而已。”^{[17]238}政恶则有烈风澍雨,如《尚书·金縢》所载成王猜疑周公便受天戒:“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21]董仲舒《春秋繁露》亦云:“王者与臣无礼,身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22]于是,有圣德之君王便奉天承运,思先天而不违。由此可见,兴起于晋泰始年间的《相风赋》,其实质是晋武帝奉天承运、圣德美治的赞歌。这些《相风赋》除了歌颂晋武帝圣德配天,奉天承运外,还歌颂了他俭以养德。如张华在其《相风赋序》中说,太史侯部的相风因其“无羽毛之饰”、“丹漆不为之容”,故“作者弗为”。而傅咸却认为张华所赋相风不如太仆寺丞武君宾所制相风简易,武君宾所制相风才达到“简易之至”,故说“张氏之赋,非其至者也”。他俩都极力强调相风制作的简易,反映了当时的俭朴之风。也是晋武帝俭以养德观念的一个折射。傅玄给晋武帝上疏中的一段话,可以给此作一个很好的注脚。傅玄疏云:“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5]1318}

傅玄、张华等人的《相风赋》不仅是颂扬晋武帝圣德的赞歌,还为其一统天下发先声。晋武帝于泰始元年受禅于魏,是因为“是时晋德既洽,四海宅心。于是天子知历数有在”^{[5]50}。魏天子秉天意而禅让,晋武帝便承天意而受禅,于是于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柴燎告类于上帝。晋武帝虽承天命受禅于魏,但天下并未一统。梁岷虽已廓清,扬越仍在包怀。既是包怀扬越,当应彰显皇德。在泰始年间,晋武帝确实做到了如同《相风赋》所赞的那样“思先天而不违”、“恭己劳谦,日昃不宁”、“在高相危,戒险自箴,守正不淫”等等。如晋武帝刚登大位即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5]52},又“兴灭继绝,约法省刑……百姓复其徭役。……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5]53}对待东吴,武帝亦是采取怀柔政策,《晋书·武帝纪》云:“(泰始二

年)三月戊戌,吴人来吊祭,有司奏为答诏。帝曰:“昔汉文、光武怀抚尉佗、公孙述,皆未正君臣之仪,所以羈縻未宾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国庆,但以书答之。”^{[5]53}又晋武帝《伐吴诏》云:“兵兴以来,八十余年。戎车出征,罔有宁岁。死亡流离,伤害和气。朕每惻然悼心,思戢兵静役,与人休息。……朕方静人用,未加罪戮。今当大修戎政,以混一六合。赏功罚惰,明罚整法。”^{[2]1490}从这两封诏书看出,晋武帝本想以德怀远,混一六合,但“吴贼失信,比犯王略”,故“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相风赋》彰显皇德,亦是用于威震夷狄,怀方来远。告知四夷须知天时,闻风而归化。

《相风赋》的兴起,也反映出了晋武帝对儒学的复兴。由汉末至晋初,战争频仍,灾疫横行,百姓流离,人心思治。人人思念向往天下太平的尧舜之世,于是凌迟已久的儒学怀仁精神便应运而复。正如《晋书·武帝纪》所云:“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谏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5]80}傅玄的《掌谏职上疏》亦阐述了晋初摒法术、明礼教,弃霸道、行王道的思想转变。其疏云:“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5]1318}相风亦属儒礼范畴,在周属春官保章氏所执掌,在晋有太史执掌,又有太仆制作而入大驾仪仗成为法物,所以具有礼教的文化意蕴。反之,其礼教的文化意蕴也

是《相风赋》应运而生并繁盛于此时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 [1]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083.
- [2]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3] 王十朋. 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M]//文渊阁四库全书:卷25.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4] 佚名. 锦绣万花谷前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卷2.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5]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陈寿. 三国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7]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8]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 高承. 事物纪原[M]//文渊阁四库全书:卷2.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0]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500.
- [11] 孔颖达. 礼记正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50.
- [12]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9:367.
- [13] 朱朝瑛. 读诗略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卷5.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4] 佚名. 三辅黄图[M]//文渊阁四库全书:卷5.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5] 虞世南. 北堂书钞[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9:518.
- [16] 周应合. 景定建康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卷2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7] 佚名. 西京杂记[M]. 向新阳,刘克任,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18] 彭大翼. 山堂肆考[M]//文渊阁四库全书:卷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9] 贾公彦. 周礼注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19.
- [20] 李昉. 太平御览[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79.
- [21] 孔颖达. 尚书正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7.
- [22]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92:387.